

學者論治學

第一手資料的重要性

林翠鳳*

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》以過人的堅毅韌性，細水長流地走過十五年後，而今改組升格為《館刊》，誠乃可喜可賀之盛事。《館刊》「學者論治學」專欄，立意良善，旨在扎深學習，切磋交流。後學不敢以學者自居，至今仍自勉為一個學習者，不揣淺陋，謹就學習的一點心得，提出就教方家，期能拋磚引玉，共揚學海之美。

學習與研究都建立在資料的基礎上。資料是一個籠統的概括辭，泛指一切可供參考或研究的材料。若依據來源分類，可大別為**第一手資料與第二手資料**¹。第一手資料是呈現或接近原來樣貌的資料，也稱原始資料、直接資料。包括文獻、實物、口述資料等類型。例如手稿、檔案、信函、日記、回憶錄等，再如照片、實體文物、遺跡、建築等，又如影像、錄音、訪談等。**第一手資料具有強烈的證據性和稀有性，可貴而重要。**學術研究講求科學辯證，應該重視第一手材料，才能使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科學性更具說服力。第二手資料則是經過他人轉載引用、分析詮釋、重組甄別之後的資料，也稱間接資料。可以輔助對主題的認知和觀點，當一手資料缺乏時，二手資料也很有價值的參考。

在我的學習歷程中，透過挖掘第一手資料，常常能得到意外的驚喜，對提升研究內涵的質與量很有幫助。茲就四方面舉例見證之。

一、校正文獻誤漏

筆者從事高雄文學名家鄭坤五（1885~1959）的研究過程中，因有感於文獻不足，親自走訪了鄭氏親族友好，獲贈了許多珍藏的手稿、圖片等。這對於校正登載於報刊上的作品，提供了很大的幫助。

例如，日治時期《南方》半月刊連載鄭坤五「蓬萊清籟」專欄，其中有日

* 林翠鳳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。

¹ 西方學者流行的劃分法，將史料分為「原料」(Primary Sources)和「次料」(Secondary Sources)，一般稱作「第一手資料」和「第二手資料」。潘樹廣主編《中國文學史料學》(安徽：黃山書社，1992年8月第1版)，根據史料形成的不同情況，將文學史料分為三個層位：第一層位的文學史料，指作家本人的著作，群體性文學活動的當事人或事件的目擊者的撰述。第二層位的文學史料，指同時代的非當事人的記錄。第三層位的文學史料，指根據前代遺存的史料，進行綜合、分析、取捨而寫成的資料性著述。此種分類法較為精細，可供參考。

籍詩人杉聽雨〈丹洲途次〉絕句一首²，從題面與內容看來皆無異樣。然取鄭坤五「蓬萊清籟」手稿本以對校法進行校勘之後，赫然發現：手稿本中金井芝恭〈避暑〉詩與杉聽雨〈丹洲途次〉詩並列抄錄，而《南方》半月刊則將杉聽雨〈丹洲途次〉詩題，搭配了為金井芝恭〈避暑〉詩作。顯然排印者恰好一次性地脫漏了比鄰並列的〈丹洲途次〉的詩作，與金井芝恭的詩題。因藉由鄭坤五手稿得以還原二詩正確原貌如下：

丹洲途次 杉聽雨

遠樹斜暉送亂鴉，山陰早已暮寒加。客中又過重陽節，一路開殘黃菊花。

避暑 金井芝恭

避來三伏暑，踏破二毛山。採藥今何處，逍遙積翠間。

這樣的誤漏若無原稿比對，一般是看不出來的。幸有手稿本提供原始資料³，而得以校正此一錯誤。

胡樸安、胡道靜《校讎學》有言：「治書之對象為書本，其目的將校理訛亂書籍，使各還其真也。……治學必以書本為根據，若書本不真，所治之學必膚淺誤謬。故治書乃治學之基本功夫。」⁴治書是瞭解作家作品的基礎，亦即針對文學文獻的整治，而第一手資料正可以準確地提供有效訊息。

二、還原充實文本

文學家手稿是最接近作者的第一手資料，往往可以最貼近創作當時的現場。而除了作家本身的手稿之外，其生平往來經歷的雪泥鴻爪，也常常是絕佳的第一手資料，可以協助建立更立體的觀察。

例如，已故永靖地方文史達人張瑞和，將其所蒐集到的永靖詩人詹作舟書信詩文等第一手資料整理之後，出版了《詹作舟全集》。詹作舟（1891-1980）與鹿港著名詩人施梅樵（1870~1949）互有交誼，吾人運用其中二人往來的書信資料，可對施梅樵生平與作品研究加以補充。

其中，施梅樵〈甲申生日誌感〉詩同時收錄在詹、施二人詩集中，然而施梅樵《鹿江集》中僅收七言律詩兩首⁵，《詹作舟全集》則在兩首詩作之外，

² 見《南方》半月刊，昭和 18 年（1943）10 月 15 日，第 184 期，頁 22。

³ 手稿原圖，見林翠鳳《鄭坤五及其文學研究·文獻圖錄》，頁 23，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5 年 1 月。

⁴ 胡樸安、胡道靜，《校讎學》，頁 2，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90 年。

⁵ 〈甲申生日誌感〉，見施梅樵，《鹿江集》，頁 92。彰化：故施梅樵先生遺著出刊委員

尚錄存原作者施梅樵的自註一則，其註文云：

余廿四歲入泮，再就學泉州。廿六歲春二月北京張珍五太史寄信催余赴戶部就職，余祖母雙瞽寄信召余歸臺灣，時正割讓，恐祖母盼望遂歸。⁶

這則註文明白地陳述著一段作者過往的私人回憶，對認識施梅樵早期的、生平僅有的一段泉州經驗而言，是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。也正因為有這一段記錄，才能使讀者對其詩中「早期才大騰千里，詎料時乖誤一官」（〈甲申生日誌感〉二）之語背後的緣由典故，了然曉悟。否則，後人徒費疑猜，亦無從得實。《鹿江集》刊印時將此刪省，實屬遺憾。所幸友人的書信尚存，透過此一則施梅樵詩的作者自註，⁷才能補齊這段空白。

三、開發研究新徑

新資料的出現，往往可望帶來新研究題材、新討論議題，這也意謂著新研究途徑的可能性。例如，鄭坤五是日治時期以來的詩壇健將，他同時也是一位小說家、評論家與畫家，可說是一位具有詩人之心、文人之筆、畫家之眼的藝術家。他的創作量龐大，但散落各處，除了集冊出版的《鯤島逸史》之外，不見其他專書。透過這批第一手資料，除得以將其自題名的「九曲堂詩草」具體呈現之外，特別是其幾乎可謂失傳的小說，得以重新面世，包括史話小說〈活地獄〉、科學小說〈火星界探險奇聞〉、傳奇小說〈華胥國遊記〉、鄉土小說〈大樹庄勇士黃輕〉等，經校正整理後已公開出版⁸。

鄭坤五一生筆耕，創作、編輯、辦報不輟，常於報端發表作品。但隨著檔案不存，均佚失不見。所幸鄭坤五自行將其於《光復新報》、《原子能新報》上的時文評論彙集剪貼成冊，並題名為《九曲堂時文集》，再幸經子孫珍藏，才得以有機會重新繕打整理後面世。⁹

凡此皆出自鄭坤五私藏手稿，準確性無庸置疑。學界研究者也注意到這些新資料，特別是在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吳福助教授的指導下，先後提出〈鄭

會，1957年。按：甲申，乃昭和19年（1944），施梅樵時年75歲。

⁶ 見張瑞和主編，《詹作舟全集·四·傳統詩篇上》，頁318。彰化永靖：詹作舟全集出版委員會，2001年。

⁷ 〈甲申生日誌感〉詩箋原件已捐贈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，入藏登入號：NMTL20110270237。

⁸ 林翠鳳，《鄭坤五研究》（第一輯），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4年11月。

⁹ 林翠鳳，〈前二二八時期的歷史見證---鄭坤五《九曲堂時文集》點校〉1~8，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》新124-131期，2012年1-8月。

坤五《鯤島逸史》研究》、〈鄭坤五小說研究〉¹⁰、〈鄭坤五《九曲堂時文集》與二二八前夕的臺灣社會研究〉等碩士學位論文，成果最為顯著。過去鄭坤五以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中的漢詩辯護者為主要形象，在此第一手資料的出現之後，他多面向的文學才華已然可以得到更立體的認識了。

近年，鄭坤五主編的《臺灣藝苑合訂本》¹¹完整版終於複印出版，此一令人期待的第一手資料面世之後，相信也將會帶來不同的研究新啟發。

四、補充文獻不足

現代社會出版蓬勃，資訊流通發達，網路查詢十分便捷，然而想要獲得第一手資料，往往還是要依賴親身尋訪的田野調查。固然各地圖書館已經收藏許多前人著作的精華，而民間蘊藏的無限可能，其實是更大的資料庫。以臺灣文學來看，從早期被質疑「臺灣有文學嗎？」的沉潛隱抑，到如今的蔚然茁壯，其間有賴於許多人的投入民間進行調查，才得以發掘整理與研究，而大大裨益臺灣在地文史資源的充實。

例如，筆者在探索故鄉彰化田中小鎮文學歷史的最初期，遍尋各大小圖書館與網路資料庫，所得極其有限，然而對故鄉的熱情，讓我從極少的線索中，開始尋訪鄉賢前輩，走入田野進行調查，而能點滴累積出小鎮文學代表--古典詩社蘭社的輪廓。其中，蘭社創社長、名門仕紳陳紹年¹²，在田中鎮文史發展上頗有地位，但其作品闕如。經登門拜訪後，獲其夫人、嗣孫慨贈其手抄詩作《壽山堂詩稿》一份，內含詩詞文賦等，這應是蘭社詩人群，也是田中鎮現今傳世最早的一本別集，自有一定的文學史料意義。其中的〈濁水谿歌〉，記螺溪汜濫史事，堪稱為田中一頁史詩。又〈示景崧景華二孫〉等詩，傳示治家訓誨，可謂是家族史的側記。一份手抄稿，彷彿打開了歷史的記憶匣，點顯了小鎮的昔日風華。

漢代劉向《說苑·政理》曾說：「耳聞之不如目見之，目見之不如足踐之，足踐之不如手辨之。」此言強調了實證資料的層次性，也提示了資料運用的科學性，顯然古人早已對第一手資料予以極大的重視。在吾個人治學的過程中，也深深體會到：第一手資料確實是極為重要的研究基礎，值得為學者多加留心。

¹⁰ 蕭玉貞，《鄭坤五小說研究》，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7年4月。

¹¹ 陳坤崙主編，《臺灣藝苑》(合訂本)，高雄：春暉出版社，2014年12月。

¹² 林翠鳳，〈田中蘭社百年史--一個區域文學史的史料建構實例〉，《東海中文學報》第16期，2004年7月，頁345-407。